

主 编 张宪文 | 副主编 张连红 王卫星

南京大屠杀全史

The Nanking Massacre: A Complete History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南京大屠杀全史

The Nanking Massacre: A Complete History

主 编 张宪文 | 副主编 张连红 王卫星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京大屠杀全史 / 张宪文主编.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 - 7 - 305 - 10000 - 0

I. ①南… II. ①张… III. ①南京大屠杀—历史
IV. ①K26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5113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版人 左 健

书 名 南京大屠杀全史(上、中、下)
主 编 张宪文
副 主 编 张连红 王卫星
责任编辑 王其平 卢湘怡 芮逸敏 编辑热线 025 - 83593052
责任校对 李鸿敏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80 字数 1088 千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0000 - 0
定 价 280.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4756 83686452
电子邮箱 jryang@nju.edu.cn(编辑)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
—— 项目成果 ——

——顾问——

王燕文 洪银兴 陈 骏

第十章

日方的反应与应对

第一节 日本官方的反应与应对

一、在南京日本外交官的应对

日军占领南京后,冈崎胜男、福田笃泰、福井淳、田中宜昌、日高信六郎等日本外交官、领事官及使领馆警察,于1937年12月14日起随日军陆续进入南京。日本外交官返回南京后,很快与拉贝等国际委员会成员取得了联系。拉贝在日记中记述说:12月15日,“11时,日本大使馆参赞福田先生来访,我们同他商谈了我们工作计划的细节。福田先生明白,尽快使发电厂、自来水厂和电话局恢复正常不仅符合我们的利益,而且也符合日本当局的利益”^①。当天,拉贝在新街口交通银行日军司令部会见日军指挥官时又遇见了福田。在拉贝会见日军指挥官时,由福田担任翻译。

12月15日,拉贝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名义致信福田,这也是安

^① 张宪文主编,[德]约翰·拉贝著,刘海宁、郑寿康、杨建明等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3册《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页。

全区国际委员会在日军占领南京后首次致信日本外交官。拉贝在信中表示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命运的忧虑,希望日军人道地对待这些战俘:“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对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的命运深感震惊……委员会当然认为,这些中国士兵,一旦验明身份,根据法律就应当被看做是战俘,但是同时又希望,不要因此而殃及中国平民。此外,委员会还希望,日军能够根据有关战俘的战争法律规定,并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给予这些过去的士兵以宽大处理。”^①

从12月16日起,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几乎每天都致函福井、田中等日本外交官,一方面提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正当要求,另一方面列举了大量日军的暴行,希望日本外交官设法与日本军方联系,制止日军的暴行。贝德士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表示:“我曾经四五次陪同拉贝先生和斯迈思博士去与日本大使馆的官员进行会谈,这些官员们是日本外务省(Gaimusho)派来的,目的是为了缓冲为数不多的外国人与日本军事当局之间的关系……在最初的三个星期里,我几乎每天都要带着打印好的书面报告或信件去日本大使馆,经常和负责此事的官员进行会谈。这些官员包括福井(Fukui)先生,他有领事头衔;一位姓田中(Tanaka)的先生,副领事;福田先生。”^②

面对日军的暴行,在南京的日本外交官首先感到的是吃惊和恐惧,他们试图与日军当局联系,但无力阻止暴行的发生。贝德士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说,在恶劣的环境下,日本外交官“确实尽了他们的微薄之力,但是他们自己也对军方势力感到恐惧,他们能做的只是将这些情况通过上海汇报给东京方面”^③。拉贝在12月15日的日记中也记述说:“一队日本士兵要带走一部分已经放下武

① 张宪文主编,[德]约翰·拉贝著,刘海宁、郑寿康、杨建明等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3册《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142页。

② 《贝茨的证词与回答质证》,张宪文主编,杨夏鸣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7册《东京审判》,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3—84页。

③ 《贝茨的证词与回答质证》,张宪文主编,杨夏鸣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7册《东京审判》,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3—84页。

器逃到我们安全区的原中国士兵。我以德国人的身份向他们担保,这些难民已经不会再战斗,应将他们释放。我刚回到委员会总部还没进办公室,杂工就告诉了我们一个不好的消息,日本人又回来将所有 1 300 名难民捆绑起来。我、史迈士(即斯迈思——引者注)和米尔斯 3 人试图再次将这批人解救下来,但是白费口舌。大约 100 名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将这批人围起来,捆绑着拖走,准备拉出去枪毙。我和史迈士又一次开车去找福田,替这批人求情。福田答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办,但是希望渺茫。我向他指出,如果这样处决人的话,我将很难为日本人招募到劳工。福田也深以为然,安慰我并答应明天去办这事。”^①拉贝在 12 月 28 日的日记中还写道:“这里日本大使馆的官员看来有心要把我们的处境变得可以忍受一点,但是他们似乎过不了他们自己的同胞(军界人士)这一关。我们已有耳闻,这里的军事指挥部不准备承认由大使馆成立的日中委员会(类似于我们的安全区委员会)。现在证实了福田先生在他到这里的第一天对我们所说的话是对的:‘军界人士要把城里的情况搞得一团糟,而我们大使馆则设法避免这样!’遗憾的是,不论是福田先生,还是田中先生或福井先生都没有能说服军队!!”^②费吴生在 12 月 19 日的日记中也记述说:“史迈士和我携带载有 55 个新增暴行案例(均经证实)的表册再次拜访日本大使馆,并且告诉田中和福井先生今天情况更为恶化。他们保证将‘尽最大努力’,并希望事情将‘迅速’好转,但很显然他们对军方的影响很小甚至全无,而军事当局对士兵毫无约束。”^③

实际上,在南京的日本外交官并没有制止日军暴行的有效手段。拉贝在 1938 年 2 月 2 日的日记中说:“在过去的 3 天当中共有 88 起日军士兵的暴行登

① 张宪文主编,[德]约翰·拉贝著,刘海宁、郑寿康、杨建明等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13 册《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43 页。

② 张宪文主编,[德]约翰·拉贝著,刘海宁、郑寿康、杨建明等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13 册《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41 页。

③ 费吴生:《日记》(1937 年 12 月 10 日—1938 年 1 月下旬),张宪文主编,章开沅编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4 册《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4 页。

记在案。这甚至超过了去年12月份我们经历的最糟糕的时期。当我把这份报告递交到日高手中的时候，他对这些‘日本流氓’的行为表示遗憾。”^①当时日本外交官所能做的，就是将南京的真实情况向外务省报告，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抗议信转交军方及通过在上海的日本使领馆转交外务省。时任日本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的石射猪太郎回忆说：“南京于岁末的12月13日被攻克。先有紧随我军之后重回南京的福井领事的电报，继而又有来自上海总领事的书面报告，使我感叹不已。这是关于日军进入南京城后对中国人的掠夺、强奸、放火、屠杀的情报。虽有宪兵，但人数很少，无法制止。据报告，就连试图加以制止的福井领事的身边也不安全。”^②时任日本外务省东亚局第一课课长的上村伸一也回忆说：“中央的统一管制已经失效，日军于12月13日突入了南京城。不仅如此，还极尽暴行，招致了世界各国的极大反感。当时，在南京的外国人各团体寄给日本的抗议信、报告、照片等在东亚局第一课的房间里堆积如山，我也稍微浏览了一下，这些照片令人目不忍睹，惨无人道。”^③此外，福田笃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接受问讯时也回答说：

问：不论怎样，这些来自拉贝领导的（安全区）委员会的信件被寄往上海，你知道它们有没有被从上海带到东京？

答：我认为它们的副本被送到了东京。

问：你为什么会这样认为？

答：因为我被告知它们在东京被当作一个问题而得以处理。

① 张宪文主编，[德]约翰·拉贝著，刘海宁、郑寿康、杨建明等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3册《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5页。

② 石射猪太郎：《外交官的一生》，张宪文主编，王卫星编，叶琳等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33册《日军官兵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98页。

③ 上村伸一：《走向破灭的道路》，张宪文主编，王卫星编，叶琳等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33册《日军官兵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01页。

.....

问:你想是副本被送到东京的吗?

答:我不知道它们是如何被送到的。

问:但知道消息传到了东京?

答:是的。^①

在向外务省报告的同时,日本外交官还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抗议信转交给了日本军方,并要求军方派兵在外国使领馆门口站岗。日本学者洞富雄在《南京大屠杀》一书中,对在南京的日本外交官是否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抗议信转交给了日军当局一事存疑:“每次都与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取得联系,转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报告内容,这点姑且存疑。”^②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这些日本外交官确实将有关日军暴行的抗议信转交给了日军当局。关于这一点,在日军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的日记中有明确记载:12月25日,“下午,日高参事官(原注:日高信六郎,供职于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福井领事(原注:福井淳,驻南京代理总领事)前来,围绕各种话题进行了探讨。主要的意思是,如有可能,派兵去外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站岗,使得他们放心。此外,还说要尽可能快地请对我有用的外国人到南京来”^③。饭沼守在日记中还记述说:12月29日,“正在研究怎样接待来访的英、美、德、意等国的大使馆、领事馆人员时,福井书记官(南京领事)来了。据美国大使馆雇佣的支那人说,23日,日本兵到大使馆抢劫了属于支那人的私人物品,还抢劫了大使馆人员的居室,用刺刀戳门、掠夺德国大使馆的字画

① 《对福田笃泰的问讯记录》,张宪文主编,杨夏鸣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7册《东京审判》,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5—296页。

② [日]洞富雄著,毛良鸿、朱阿根译:《南京大屠杀》,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60页。

③ 《饭沼守日记》,张宪文主编,王卫星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8册《日军官兵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7页。

等等。他留下美国人写给领事的信就回去了”^①。当然，日本外交官要求军方派兵在外国使领馆门口站岗，其真实目的是为了避免因日军抢劫等暴行而引发的外交纠纷。

日本外交官在进入南京前并不知道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他们来到南京，原本也不是为了制止日军暴行的，而是作为日本外交人员及日军华中方面军的外交顾问来南京的。由于日军占领南京后，尚有二十余名西方人士留在南京，再加上南京有各国使领馆、西方国家的商务机构及外国教会学校等等，所以日本外交官来南京的目的是为了处理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避免日军与外国利益发生冲突及产生不必要的外交纠纷，以维护日本的“国际形象”。正因为如此，这些日本外交官在南京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在各国使领馆、外国人住宅等处贴上日本大使馆的布告，禁止日本士兵进入等。当日军暴行频繁发生，拉贝等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不断抗议时，日本外交官便成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与日本军方沟通、交涉的主要渠道。

从本质上说，进入南京的日本外交官是从日本立场出发来处理问题的，他们注重日军暴行涉及第三国利益的处理，极力避免影响日本与美、英、德等第三国之间的关系，而对日军屠杀中国俘虏与平民、强奸中国妇女、抢劫中国人的财物等暴行则少有关注。

由于西方媒体大量披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日本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为了避免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消息传播出去，日本外交官采取多种手段，阻止日军暴行消息的传播，以挽回日本的“国际形象”及日军的所谓“荣誉”。

首先，日本外交官多次“劝告”拉贝等人，不要说出南京的实情。拉贝在 12 月 29 日的日记中记述说：“福井先生恳请我不要把南京的情况写信告诉上海方

^① 《饭沼守日记》，张宪文主编，王卫星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8 册《日军官兵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21 页。

面,也就是说,不要报道任何使日本大使馆不愉快的事实。我答应了他,我有别的什么办法吗? 如果我的信件只有通过日本大使馆才能传递,那我就必须顺从。”^①1938年2月上旬,拉贝准备离开南京前往上海,日本领事馆代理总领事福井淳曾威胁拉贝,不要将南京的真实情况说出去。拉贝在1938年2月9日的日记中记述说:“为解决我申请往返上海的事宜,福井先生约我今天一早就去日本大使馆。也许他想再次提醒我,让我切切不可忘记,在上海只许说日本人的好话!”果然,福井当晚便对拉贝进行威胁。拉贝在1938年2月10日的日记中记述说:“昨天去日本大使馆,想会见福井先生,未遇。当晚6时,他来看我,商谈我去上海事宜。他果然忍不住威胁我说:‘如果您在上海对报社记者说我们的坏话,您就是与日本军队为敌。’”^②

其次,阻止外国使领馆官员携带电台进入南京,以防止日军暴行的消息外传。1938年1月6日,当美国驻华大使馆三等秘书阿利森乘美国军舰返回南京时,在南京的日本外交官禁止其携带电台上岸。对此,美国国务卿表示强烈不满,要求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就此事向日方提出交涉。据美国国务卿赫尔1938年1月17日致格鲁的电报记载:“请去外务省,就福井(原注:日本驻南京代理总领事)要阿利森不要在此刻将无线电设备带上岸的要求,表明:本政府无法在执行这一要求上保持沉默,本政府预期在南京的美国大使馆安装和运行无线电发报机不会收到干预,本政府要求东京政府立即向南京的日本当局发出指令,结束对这一问题的拖延,并确保不会再有与此有关的干涉。”^③

再次,竭力掩盖事实真相,淡化日军在南京的暴行。1938年1月,美、德等

① 张宪文主编,[德]约翰·拉贝著,刘海宁、郑寿康、杨建明等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3册《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5页。

② 张宪文主编,[德]约翰·拉贝著,刘海宁、郑寿康、杨建明等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3册《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8页。

③ 《国务卿致美驻日大使(格鲁)》(1938年1月17日),张宪文主编,杨夏鸣编,杨夏鸣、张志刚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3册《美国外交文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53—354页。

国外交官返回南京后,收到来自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关于日军在南京暴行的大量报告,并着手调查日军的暴行。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日本外交官竭力淡化日军在南京的暴行。1938年1月27日,阿利森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这一事件是许多小事件的积累,而这些小事件是过去几天来本使馆为了结束非法侵入美国财产所作出努力的过程中经常遭遇的。在1月25日晚与日本大使馆的福井先生就这一问题进行的一般性讨论中,他对我说我过分相信美国传教士的陈述。”^①在福井看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向阿利森报告的日军暴行是夸大其词的,并希望阿利森不要过分相信这些报告。

与日军相比,在南京的日本外交官显得相对温和,他们无力制止日军的暴行,只能对南京的混乱状况表示遗憾和忧虑,并将国际委员会的抗议信转送外务省。同时,作为日本外交官,他们从本国的立场出发,极力掩饰事实真相,阻止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消息在国际社会传播,以挽回日本的“国际形象”和维护日军的所谓“荣誉”。

二、外务省的应对

日本外交官进入南京不久,即向外务省报告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时任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的石射猪太郎在提交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书面证词中说:“大约在我被任命为东亚事务局局长两个月之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大约在12月13日,我国军队胜利进入南京。有鉴于此,我国驻南京代理总领事福井淳(Fukui Makoto)从上海返回他(在南京)的岗位。他从南京向外务

^① 《1938年1月28日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新闻稿》,张宪文主编,杨夏鸣编,杨夏鸣、张志刚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3册《美国外交文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06页。

省递交的第一份报告就是有关当地我国军队暴行的。”^①

除了来自南京日本外交官的报告之外,由于日军击沉美、英两国舰船,并在南京不断侵害美、英等国的利益,甚至发生日军士兵殴打美国外交官的“阿利森事件”,日本外务省还不断接到来自美、英等国的抗议。

1938年1月26日,美国驻华大使馆三等秘书阿利森在调查日军暴行时被日本兵打了耳光。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也就是1月27日,阿利森向美国国务卿报告了事件经过:“昨天在调查非法侵入美国财产事件的过程中,查尔斯·里格斯先生(美国公民,美国机构金陵大学教师)和我都被日本士兵打了耳光,里格斯还遭到进一步的攻击,衣领被撕坏。这一事件是许多小事件的积累,而这些小事件是过去几天来本使馆为了结束非法侵入美国财产所作出努力的过程中经常遭遇的。”^②

美国国务院在接到阿利森的报告后,于1月28日晚指示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向日本外务省提出口头抗议,并要求格鲁“强调美国政府在考虑该事件的严重性时,是考虑这样的事实,即整个事件,包括美国外交人员被日本士兵打耳光并非孤立的案例,而只是其中之一,并且与日本士兵多次非法侵入美国财产和漠视美国的权益是联系在一起的”。“美国政府期待得到外务省的适当的道歉和保证日本政府将采取充分的措施惩罚冒犯者。”1月29日晚,格鲁与日本副外相进行了长时间会谈,“格鲁大使强调尽快满足美国政府要求的重要性”。^③

面对来自日本外交官的报告和美、英等国的抗议,日本外务省东亚局长石射猪太郎也感叹不已:“上海来信,详细报告了我军在南京的暴行。信上所说的掠

^① 张宪文主编,杨夏鸣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7册《东京审判》,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08页。

^② 《1938年1月28日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新闻稿》,张宪文主编,杨夏鸣编,杨夏鸣、张志刚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3册《美国外交文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06页。

^③ 《1938年1月31日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新闻稿》,张宪文主编,杨夏鸣编,杨夏鸣、张志刚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3册《美国外交文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08—409页。

夺、强奸等惨不忍睹。呜呼，这就是皇军吗？这也许是日本国民民心颓废的表露吧。这是个很大的社会问题。”^①石射猪太郎接到来自南京日本外交官的报告后，将报告转交给了军方，并多次在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三省联席会议上提出此事。对此，石射猪太郎在提交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书面证词中说：福井淳“从南京向外务省递交的第一份报告就是有关当地我国军队暴行的。这份电报报告随即被转交给陆军部军务局局长。当时，外相对此事感到警觉和担心，敦促我迅速采取一定的措施查禁此类不光彩的行径。我答复他，该电报报告的副本已经转交给陆军部，我还准备在即将举行的陆军部、海军部和外务省联席会议上告诫军事当局注意这类行为”。“这次联席会议很快就在我的办公室举行了。（这类会议在东亚事务局局长的办公室不定期举行。起初参加会议的有陆军部、海军部的局长们以及外务省主管东亚事务的局长。然而，后来的惯例是陆军部、海军部军务局第一课的课长，外务省东亚事务局第一课的课长代替各自的上级与会。）在会上，我提出了暴行问题，提醒陆军部军务局第一课课长注意‘圣战’的崇高理想以及‘帝国军队’光荣的名声，要求他立即采取严厉的措施加以制止。军方代表理解我的感受，答应了我的要求。会后不久，外务省就收到了驻南京代理总领事的书面报告。该报告系一份有关我军暴行的详细记录，由在南京的第三国侨民代表组成的一个国际安全委员会起草，用英语打印。我国驻南京总领事得到了该记录的副本，并把它寄往外务省。我仔细阅读了这份报告，并就此扼要地向外相作了汇报。征得外相同意，在随后的一次联席会议上，我向陆军部军务局第一课课长出示了这份报告，并重申了我的要求。”^②从石射猪太郎的证词中可以看出，外务省向军方提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问题，并不是出于人道的考

^① 《石射猪太郎日记》，张宪文主编，王卫星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8册《日军官兵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② 张宪文主编，杨夏鸣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7册《东京审判》，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08—509页。

虑,而是“‘圣战’的崇高理想以及‘帝国军队’光荣的名声”。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接到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报告,尤其是“阿利森事件”及日军抢劫美、英、德等国财产的报告后,也向军方提出采取措施制止暴行的要求。石射猪太郎在提交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书面证词中说:“我得知,广田外相曾经请求杉山陆相针对南京暴行事件迅速采取严厉措施。这个情况是广田外相当时告诉我的。”^①同时,广田还在日本内阁会议上提出了该问题,内阁就此进行了讨论。1938年1月19日,日本外务省美洲局局长芳泽谦吉在与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参赞杜曼会谈时表示:1月17日,在日本外相与美国驻日大使会谈后不久,他便去见了外相,外相将美国大使陈述的内容告诉了他,外相还让他翻译美国的抗议照会,以便在内阁会议召开之前提交给与会者。1月18日,日本召开内阁会议,会上讨论了美国的抗议照会。^②美国驻日大使格鲁也证实了广田外相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及侵害美国财产等问题提交给了内阁会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方在证据总结时指出:“1月19日,格鲁从东京报告说,广田已经把他的(格鲁的)抗议提交内阁,并且‘正在考虑采取强硬措施,使前线的部队服从东京的命令。他说他大概明天可以向我们通报这些将要采取的措施’。”^③

由于日军占领南京前后发生了“帕奈”号事件、“瓢虫”号事件、“阿利森事件”,以及日军抢劫第三国公私财产等事件,日本外务当局不断接到美、英等国口头或书面的抗议。在此形势下,外务省一方面向军方提出制止暴行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不断向美、英等国道歉。“阿利森事件”发生后,美国迅速向日本提出抗

① 张宪文主编,杨夏鸣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7册《东京审判》,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09页。

② 《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参赞(杜曼)与日本外务省美洲局局长(芳泽)会谈备忘录》,张宪文主编,杨夏鸣编,杨夏鸣、张志刚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3册《美国外交文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81—382页。

③ 《南京的浩劫》,张宪文主编,杨夏鸣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7册《东京审判》,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07页。

议,1月30日晚,日本副外相约见美国驻日大使格鲁,以日本政府的名义就日本士兵攻击阿利森一事向格鲁深表歉意,同时保证在经过严格调查后,日本政府将采取适当措施,惩处与该事件有关人员。^①

与此同时,日本外务省还向日本驻外使领馆通报有关情况。如1938年1月16日,驻上海日军新闻检查官在检查中发现,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特约记者田伯烈将要拍发的新闻稿件中有“不适当之处”,要求田伯烈修改稿件,“并在他修改了稿件中不适当之处后,由检查官在17日晨用电话通知他,可以拍发这份稿件”。同时,驻上海日军当局要求日本外务省“因为此事可能为路透社和美联社大为渲染,请将此件与上面提到的别函由伦敦拍发给在欧洲的所有使馆,并转往华盛顿、纽约及美国西海岸”^②。17日当天,广田外相就签发了外务省致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的电报,将田伯烈的新闻稿内容通报给了日本驻美大使馆。该电报当时被美国海军情报部门破译。电报援引田伯烈的新闻稿称:

自前几天返回到上海以来,我调查了报道中的日本军队在南京和其他地方所犯的暴行。可靠的目击者的口头描述以及那些信誉毋庸置疑的个人的信件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日本军队过去的举止及目前的行为方式使人们想起阿提拉(Attila)^③和他手下的匈奴人。不少于30万中国平民被屠杀,在许多情况下是以残忍的方式进行的。抢劫、强奸,包括对少女的强奸,以及对平民惨无人道的兽性,在敌对行动已经停止了数星期的地区继续被报道。这里品行良好日本平民感到深深的耻辱——日本士兵在上海本地胡作非为的系列事件凸显了日本军队在其他地方应受谴责的行为。今天

① 《1938年1月31日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新闻稿》,张宪文主编,杨夏鸣编,杨夏鸣、张志刚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3册《美国外交文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09页。

② 参见杨大庆《1938年1月17日“广田电报”考证》,《民国档案》1998年第3期。

③ 阿提拉,入侵罗马帝国的匈奴王。